

走過半個世紀， 「中國研究」何去何從

梁元生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於1967年，目的在於保存及發揚中國文化，以及推動有關學術研究。今年適值五十周年，故趁機緬懷回顧一下，並藉此機會作一檢討和反省。

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之時，中大山頭，牛山濯濯，一片荒蕪，只有稀疏零落的幾棟樓宇，位在今日「百萬大道」中央的研究所的標誌性建築還沒有興建。大學的領導層也還在城市高樓內辦公，沒有正式遷入中大的馬料水校園。然而，他們都是有心人和遠見者，有心在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做一點事。在李卓敏校長領導之下，在中大成立數年之後，他們就創辦了研究所，那時正值中國社會紛亂之秋、文化大革命熾烈之時，中國的傳統文化備受批鬥，分崩離析，這批中大學者在痛心之餘，也在積極構思於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重塑中國文化的藍圖和方法。故此，1967年11月1日李卓敏校長正式宣告在中大成立研究所，正標示着中大對承傳與發揚中華文化這一歷史使命的具體承擔。

在成立研究所之後，他們立地存照，相片(附圖)中是下列的八位中大人：(由左至右)王德昭、陳荊和、全漢昇、周法高、李卓敏、牟潤孫、唐君毅、薛壽生。當中以文史學者為多，所以初期的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，也偏重文史研究。其中王德昭是中國近代史教授，陳荊和是東南亞史專家，全漢昇是中國社會經濟史權威，牟潤孫是中國史學史的講座教授，周法高教授是中國古文字學專家，唐君毅教授專治中國哲學，只有薛壽生教授的研究興趣偏重於現代中國社會政治。這些學者都分屬於中大人文社科的不同院系，而李卓敏校長則身兼研究所所長之職，此可見其推動中國文化研究之心志。研究所初期，個別教授學者皆在其專屬範圍內致力研究工作，大致分成七個研究小組，包括：

- (1) 中國上古及中古史(負責人：牟潤孫教授)
- (2) 中國近代史(全漢昇教授)
- (3) 中國語言及文學(周法高教授)
- (4) 中國思想及哲學史(唐君毅教授)



左起：王德昭、陳荊和、全漢昇、周法高、李卓敏、牟潤孫、唐君毅、薛壽生。(資料圖片)

(5)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 (陳荊和教授)

(6) 現代中國研究 (薛壽生教授)

(7) 特別研究計劃，包括林語堂詞典計劃 (李卓敏校長)

回顧研究所的初期計劃，顯然規模頗具，雖然還沒有「研究中心」的設置，但已經把現今所謂「中國研究」或外國的「漢學研究」範圍包羅進去了。那時，個別教授把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內，初時每年只出版一期，近年學報則每年出版兩期，至今不輟，成為研究所的一本代表性刊物。

創所之初，除了鼓勵學術研究，還積極籌備建設文物館，用作收藏及展覽中國古代文物，包括甲骨、青銅、陶瓷及書畫。這方面的動力和資源，主要來自利希慎基金會及北山堂基金的利榮森先生。利先生乃香港商界名人，他和利氏家族對中大各方面的發展，都有大力捐助和重要貢獻。而利先生所創立的北山堂基金，更是支持研究所的重要支柱。文物館於1971年開館，首任館長是屈志仁教授，在他領導之下，文物館舉辦過多次大型展覽，包括古琴展和蘭亭展，成為城中藝術界的盛事。屈館長和北山堂合作無間，大大豐富了文物館對書畫、陶瓷和碑刻的收藏，也開展了藝術研究的工作。屈館長於1981年移民美國，館長由藝術系的高美慶教授繼任。

1978年李卓敏校長退休前，中大已經逐漸由書院聯邦制，改變成為中央領導、學院學科和書院生活互相配合的新架構，這個改良的書院制就成為中大的特色。但研究院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直屬中央，更顯出中國文化在中大辦學使命中的重要地位。80年代以後的研究所，以研究中心為主，代替了早期的研究小組，從事較為長期性的研究工作，以及定期出版學術叢書、期刊等。這時期的研究中心有鄭德坤教授成立的「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」、宋洪

和高克毅領導的「翻譯研究中心」，以及由劉殿爵教授主持、由原來的「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」改組而成的「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」。

李校長之後的馬臨校長，不再兼任研究所所長之職，先後由陳荊和教授及鄭德坤教授兼任所長，至1986年始由陳方正博士全職出任所長。隨着大學的擴大和組織制度上的改變，自此研究所也邁進一個新的時期。

陳方正博士擔任研究所所長之前，曾任中大物理系教授及大學秘書長，行政經驗豐富。雖然他的出身是個科學家，但家學淵源，人文底蘊極深，中英文筆鋒流利，對傳統文化及現代科學，皆有其一得之見。他所寫過的多篇文章和味道雋永的榮譽學位讚辭（巴金和吳清源），令人讀後難忘，印象深刻。在他任內，研究所開創了不少新方向和新計劃，例如用電腦編纂中國古籍文獻索引資料庫，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評定為全港學術成績卓越計劃之一；並且以此為基礎，在研究所下成立了「中國古籍研究中心」。

方正所長的最大貢獻，應該是把原來研究所重視的古典研究，推向近現代中國研究，尤其是六四之後，海內外華人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思潮極之關心。方正所長在這段非常時期，創辦《二十一世紀》雙月刊，以「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」為宗旨，邀請到金觀濤、劉青峰夫婦來所。青峰擔任編務，觀濤則主持新建立的「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」，幾年間廣招學人，出版思想性的著作，開辦各種有關近現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，並且以《二十一世紀》為平台，帶動有關中國改革和變化的討論，引起海內外學者，甚至全球華人的關注。如今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出版也已經超過四分之一世紀，回顧這份刊物由創辦至今的歷程，中國在此期間正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，由鎖國政策和貧窮經濟，到改革開放帶來迅速發展與高速增長，使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，在經濟和國際政治上已經蛻變成為世界強國，地位和研究所成立時所面對的情況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在中國崛起，成為世界強雄之後，「中國研究」更成了國際研究機構和大學的熱門課題。在60年代文革時期的香港，中大學者關心的課題，如傳統文化如何延續，如何與現代社會接軌等問題，顯然和今日學者所關心的略有不同。例如中國科技的發展，「一帶一路」的契機，商業和社會的變化等，皆是當代學者集中眼球的地方。在這當兒，中國文化研究所慶祝五十周年的時候，我們當然希望不忘初心，仍然努力發揚中華文化，推動學術研究。走過了五十年，今時今日的「中國研究」，文化建設當然仍是最重要的議題。但其他的研究範圍如考古藝術、語言文學，乃至傳統文化的保存和發揚，在中國大陸，不少研究機構和大學也積極地投入研究工作，香港的學者應該扮演着怎樣的角色？中大原初對發揚中華文化的初衷和使命，在半個世紀的鉅變之後，應該作何反省？而研究所的方向和計劃，又應從哪個新的角度重新思考？這是當前讓我們最逼切思考的問題。

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、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